



始知清论误苍生

——历代诗人笔下的王衍

高昌

西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太尉王衍被匈奴汉国(前赵)大将石勒俘获,最终压死在一堵土墙之下。这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的清谈人物,临终才说了句悔恨的话:“向若不祖尚浮虚,勦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为时已晚,悲剧就此落幕。从那以后,王衍的名字便成了清谈误国、玄谈废事的代称。历代诗人,每借之以长嗟、以浩叹。

王衍,字夷甫,曾任太尉、尚书令、司空、司徒等要职。他容貌整丽,神姿高彻,“美姿仪”“面至白”,手里总拿着一柄玉柄麈尾,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说错了也能马上圆回来。当时的人用雌黄涂改错字,见他这样随意改口,就叫他“口中雌黄”,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成语“信口雌黄”。他让弟弟守荆州,让族弟守青州,自己盘踞中央,称之为“三窟”之计。他还喜欢故作清高姿态,自称厌恶钱财,连“钱”字都不肯说,只叫“阿堵物”,即“这个东西”的意思。“阿堵物”后世成了钱的代称。然而机关算尽,终乏治国安邦的实效。石勒当面斥责王衍:“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王衍死后不久,东晋名将桓温登上平乘楼,北望中原,发出一声叹息:“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一叹,道出了后人对西晋灭亡的沉痛反思。

晚唐诗人罗隐在《王夷甫》一诗中,以冷峻的笔触咏叹这段往事:“把得闲书坐水滨,读来前事亦酸辛。莫言麈尾清谭柄,坏却淳风是此人。”罗隐身当唐末衰世,对王衍以清谈败坏世风的罪责感慨良深。麈尾本是清谈名士的标配,罗隐却指认,正是这貌似风雅的“清谭柄”,毁掉了厚厚的士风根基。与罗隐同时代的周昂,则在《王夷甫》中进一步追问:“六合谁为辅弼臣,八风昏处尽胡尘。是知济弱扶倾木,不属高谈论人。”“天下板荡,胡尘纷乱之际,真正需要的是济弱扶倾的实干之才,而清谈虚论之辈,终究担不起“辅弼”的担子。

北宋苏轼在《读王衍传》中直言:“文非经国武非英,终日虚谈取盛名。至竟开门延羯寇,始知清论误苍生。”这首绝句可谓鞭辟入里:王衍文不能经国、武不能安邦,仅凭虚谈便博得“盛名”,最终开门揖盗、自招其祸,“清论误苍生”五字,力透纸背。

南宋与东晋同为偏安之局,历史的相似令宋人尤为痛切。辛弃疾在《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甲辰岁寿》中更以沉痛之笔写道:“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陆沉,几曾回首!”王夷甫这些人,致使神州大地沉沦陷落,但是他们曾回头反省过?与辛弃疾同时代的爱国诗人陆游,在《登千峰榭》中亦慨叹:“一生未售屠龙技,万里犹思汗马功。王衍诸人宁足贵,姜维竖子自应穷。”陆游一生以恢复为念,于王衍之流尤为不齿,其“王衍诸人宁足贵”一句,看似淡淡说来,实则鄙夷至极,连责骂他们都觉得多余,因为他们根本不值与真正的志士相提并论。

南宋末年的邓林在《王夷甫》中,对王衍的鞭挞愈发深峻:“玉麈清谈吐妙言,清流都指作龙门。白头苟活尊胡虏,夜半排墙未是冤。”“玉麈清谈”四字勾勒出王衍清谈时的得意之态,“清流都指作龙门”则讥讽天下士人竟奉他为魁首、群起附从;而“白头苟活尊胡虏”一句,直指王衍被俘后阿谀石勒、劝其称帝的丑态,最后以“夜半排墙未是冤”作结,说他被石勒推墙压死,一点也不冤枉。刘辰翁在《金缕曲·九日即事》中亦抱同样的憾恨:“千古新亭英雄梦,泪湿神州块土。叹落日、鸿沟无路。一片沙场君不去,空平生、恨恨王夷甫。”新亭对泣的英雄旧梦,早已随风而逝,神州板荡,落日苍茫,而王夷甫徒负盛名,终究一误国可恨之人。

宋末元初的黎廷瑞在《水龙吟·九日登城》中,发出声声喟叹:“荒城落日西风,满街芳草无行路。楼台羽化,蜚飞故苑,蛩吟残础。不减承平,半湖秋月,隔溪烟树。慨江南风景,一朝如许,教人恨、王夷甫。”同一时代,爱国诗人文天祥则在《壬午》诗中,将王衍与五代时期的冯道并列作为失节之辈:“王衍劝石勒,冯道朝德光。末俗正靡靡,横流已汤汤。”文天祥身处囚途,却持节不屈、至死不渝。他笔下的王衍,不仅是清谈误国的庸臣,更是临危折节、阿谀敌首之人。

元代诗人成廷圭在《次顾清逸见寄韵》中咏道:“满目干戈独损神,古之忠义不谋身。杜陵白发空忧国,王衍清谈已误人。”“古之忠义不谋身”与“王衍清谈已误人”形成强烈对比,真正的忠义之士不计个人安危,而王衍之流只知自保,空谈害人。丁鹤年在《过安庆追悼余文贞公》中,更是以“甘与张巡为厉鬼,肯同王衍误苍生”来赞颂殉国烈士的忠魂。张巡守睢阳,死节不屈,与王衍苟活求荣恰成两极,高下立判。

元末明初的高启在《寄题张著作青山隐居》中,则以一种旁观的口吻咏道:“平生应笑王夷甫,末路方言少宦情。”言下之意,王衍一生汲汲于仕途,直到临死才说自己“少不豫事”,岂不可笑?真正的隐士如张著作(即张羽,明初“吴中四杰”之一),青山为伴、抱琴候客,才是洞明世情之人。

明代的诗人继续将王衍作为清谈误国的典型加以鞭挞。丘浚在《竹林七贤图》中反思:“晋人旷达尚玄语,弃置礼法胡如土。神州陆沉二百年,当时岂但王夷甫。”丘浚认为,王衍固然有罪,但西晋清谈之风弥漫朝野,岂止王衍一人?“神州陆沉二百年”之祸,是整个时代的悲哀。清谈之罪,夫复何言!邓云霄在《新亭》中咏道:“挥麈谁云无壮士,围棋真信有奇才。当时怪杀王夷甫,我辈谈锋莫浪开。”此诗以“当时怪杀王夷甫”表达激愤,更以“我辈谈锋莫浪开”自我警醒——清谈误国之鉴不远,时人岂可再犯?魏学洵《王衍》则以嘲讽口吻咏道:“却笑王夷甫,白首王清言。劝人着枯黄,齷齪不足论。”“白首王清言”五字,极尽讽刺,一辈子就只会耍嘴皮子,到老也改不

了。吴琬在《张同府菊会再和》中明确表态:“酷爱陶潜逸兴,生憎王衍弄虚谈。”“酷爱”与“生憎”对举,爱憎分明,陶渊明辞官归隐、躬耕自食,是真隐士;王衍口谈玄远,实则贪位,是真虚伪。沈明远《漫兴用郭羲仲韵》亦云:“清谈王衍休挥麈,多事元规已污尘。”直呼“休挥麈”,可见对清谈之风的深恶痛绝。

郑真在《三月四日会饮》中以“誓与阮生同一醉,肯如王衍只清谈”申明心志,宁可学院籍借酒浇愁,也不愿像王衍那样空谈误国。曹好益《读晋史》则以设问收束:“晋日清谈盛,高名王衍多。不知三窟策,还载老庄么?”讽意十足,王衍一面谈老庄虚无,一面又为自己经营“狡兔三窟”,这样的虚伪,老庄之学岂能容之?

明清初,诗人们对王衍的批判更添一层切肤之痛。阎尔梅在《至东海遇刘泽清率总河王永吉暨诸将官复归淮上乞降余止之不得诗以叹之》中写道:“陈情幕下羞王衍,解甲桥头怨杜威。”“杜威”即五代后晋降将杜重威。阎尔梅将投降将领与王衍相提并论,其“羞”字饱含对变节者的鄙夷。毛奇龄《客邸别故人子傅以成远游》更直言:“苍生久恨王夷甫,佳子当如孙仲谋。”天下苍生恨王衍久矣,而真正的希望,在于培养像孙权那样有担当的后人。朱鹤龄《咏史》则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审视:“王衍罹排墙,殷浩终废路。高名竟何为,徒以祸人国。处士盗虚声,自古深叹息。”徒有虚名而祸国殃民之辈的名声再高,终究是“盗”来的,终究是“徒以祸人国”。

清代诗人延续了这一咏史主题。翁方纲在《观汪龙冈所藏右军临晋葛武侯墨迹卷》中写道:“草篆驰议北伐初,安西之谋非壮图。清谈不作王夷甫,佳儿岂是管葛徒。”以“清谈不作王夷甫”来赞颂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实干精神,正反对比,用意深远。田雯《咏史》则聚焦于王衍之死:“王衍自清流,狡黠营三窟。石勒兵一至,排墙空乞活。”“自清流”与“营三窟”的强烈反差,揭穿了所谓名士的虚伪面目,一面自命清高,一面暗中经营退路,到头来“排墙空乞活”,何其讽刺!

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在《仙屏中丞见和前诗,感事述怀》中写道:“陆沈应咎王夷甫,道隐思为贺季真。”面对晚清危局,诗人再次从历史中追索根源,认定国土沉沦,王夷甫实难脱其责。叶昌炽《再续童谣》更以“浮议误国王夷甫”来谴责误国之臣。虚谈废务,误国误民,古今同慨。

王衍其人,历经后世诗家反复吟咏,形象不断叠加、不断深化,终成一个鲜明的历史意象:清谈误国。王衍之死,留下的是一则关于空谈与实干的恒久警示。每当论及士风玄虚、空谈误事之际,诗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提起这个名字。这位舌灿玄言却葬送江山的清谈人物,以自身的悲惨遭迹为后人写下了极为沉痛的反面教材。“始知清论误苍生”七字,正是后世诗家对王夷甫之流的定评,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箴言。

大典撷珍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在南京文渊阁修成的,修成之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之中。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帝朱棣将国都迁往北京。同时,《大典》正本也悄然北上,存放于北京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再迁至皇宫中的文楼(今故宫仁仁阁)。

《大典》修成之后,有人提议进行刊刻,由于卷帙巨大、工费浩繁而作罢。因此,它便在北京的皇城根,静静地沉寂了100余年。这期间,大约只有弘治皇帝朱佑樞和嘉靖皇帝朱厚熜对它产生过兴趣,尤其是嘉靖皇帝,读书有癖,经常按部在《大典》中查找,“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的一个深夜,紫禁城突起大火,奉天门、三大殿相继陷入火海,火势直逼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帝在深宫之中一夜连下三四道圣旨,严令左右务必将全书抢救出来。宫中人员冒着浓烟与烈火,将这部一万多册的巨著悉数转移,才让《大典》逃过一劫。

这场大火让嘉靖帝下定决心:必须为《大典》抄录一部副本,贮之他所,以备不虞。谁也不曾想到,这一项因火灾启动的重抄工程,侥幸为《大典》留下了火种——当永乐正本最终湮没于历史尘烟、踪迹成谜时,正是这部嘉靖副本,如一线孤脉,不绝如缕,维系着这部旷世巨典的文明余绪。

大火过后,重录之事几经酝酿,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正式启动。嘉靖帝将此事交给内阁大学士徐阶全盘盘画,又任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翟景淳为总校官,而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也以分校官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些隆庆、万历之际的名臣,都在这场抄书工程里留下了姓名。

抄书的核心是选对写字的人。为保证字迹工整统一,吏部与礼部专门举行了一场“糊名考试”,在全国儒生、监生中选拔精于楷书的善书者,最终录取了程道南等109人。这109人不是普通的抄书匠,而是层层筛选出的书法好手,他们的任务不是创作,而是“复制”——用代表着雍容典雅的“台阁体”,一字不差、一笔不苟地照正本抄写。

朝廷为这支抄书团队配备了顶级后勤:内府御用监调派画匠、硃光匠、纸匠全程待命,专门处理纸张与装帧细节;顺天府供应上等砚台与笔墨;惜薪司按日配送取暖木炭;光禄寺负责每日酒饭膳食;翰林院按月发放米粮作为酬劳。甚至连锦衣卫都被调来巡逻值守,严防典籍被私自带出或损毁。从笔墨纸砚到吃住安保,不容有半分差池。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正本原貌,工程定下了严格的抄写制度,每一条都指向“高度还原”。

最核心的规则是“每日限抄三页”。109名抄手每人每天抄写3页纸,绝不贪多求快。这3页不是抄完就算,而是要完全匹配正本的行款、字数、字体,连标题首字的篆、隶、草体,文中的插图样式,都要原封不动描摹下来。如果出现错漏,整页必须全部重写,无论重写几次,最终只算一页的工作量。若是有人敢混报怠工、敷衍了事,不仅本人受罚,连负责监管的官员也要连坐治罪。

出人管理同样严格。所有缮写人员必须晨入暮出,每次领取正本都要当面登记,下班时如数交还,绝不允许将任何《大典》带出宫外,更不准雇人代写代抄。

在整套质量管控体系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卷末的抄录衔名制度。每一册《大典》抄写、校勘完毕后,都必须在正文末尾空白护叶的固定位置,按官职从高到低依次题写所有相关人员的衔职与姓名,形成一份可追溯的“质量责任书”。

这套衔名分为固定的四个层级。最前列是“总校官”,共设二人,由朝廷钦点的高级文官担任,全程总领校勘事务,负最终责任。此次重录的总校官便是礼部左侍郎高拱(后官至内阁首辅)与左春坊左谕德翟景淳,二人都是当时士林公认的文章耆老。

其次是“分校官”,一般每数册配置一员,多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词臣出

贮之他所 以备不虞

嘉靖重录《永乐大典》始末

刘鹏

任,负责逐页核对文字、校订讹误。其中四位后来官至宰相,包括张居正、张四维(万历中任内阁首辅)、徐时行(即申时行,状元,万历中任内阁首辅)、王锡爵(万历中任内阁首辅)。其余官至尚书、侍郎等高位者也比比皆是。

再往下是“书写儒士”,也就是实际执笔抄录的善书儒生,每册对应一名抄写者,直署其名,109名经考试选拔的儒生都以这样的方式留在了《大典》之中。

最后是“圈点监生”,每册一般两人,多由国子监监生、儒士担任,负责为正文标注句读,保证文章断句准确无误。

所有衔名一律用与正文一致的端正楷书题写,格式齐整,秩序井然。这套制度的核心便是“实名追责”:日后一旦查出某册有错字、漏页、格式违制等问题,便可直接通过卷末署名追溯到具体责任人,从抄写者到校勘官逐级追责,轻则罚俸重写,重则降职治罪。正是这种把责任落到每个人头上的机制,保障了嘉靖副本较高的抄写质量。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帝喜欢《大典》每册前后的空白白护叶纸,将其视作为“余纸”一一裁下,用来制作各类箋纸或赏赐大臣。幸而具体实施者明白卷末重录衔名的可贵,在裁纸时保留了这部分内容,才给我们研究嘉靖重抄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这场浩大的抄录工程,从嘉靖四十一年秋正式开工,直到嘉靖帝去世都没能完成。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驾崩,此时《大典》重录仍在收尾阶段。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全书才最终抄写完毕,前后历时近五年。

完工的嘉靖副本,与永乐正本做到了“如出一辙”:全书同样是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开本约高50厘米、宽30厘米,并采用内府标准的包背装,黄绢书衣,版式、行款完全照正本复现。

副本抄成之后,入藏有着“金匱石室”之称的皇史宬——这座建筑通体以砖石构筑,厚墙深院,防火功能突出,是明代存放皇家档案与核心典籍的禁地。至此,当日嘉靖帝“贮之他所,以备不虞”的初衷彻底落地,《永乐大典》终于拥有了一份完整的文明备份。那些伏案抄写的儒生,严格的规则、数年如一日的一笔一画,最终都化作了文明延续的底气,静静等待着后世的开启与回望。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文史漫话

万斤青玉铸瑰宝

——故宫博物院藏《大禹治水图》玉山赏析

周惠斌

大禹治水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我国广为传颂,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宁寿宫乐寿堂)内陈列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形象再现了大禹与百姓开山治水的艰辛场景,凸显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山河的智慧意志和精神力量。

大禹不仅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他还继承舜位,成为夏王朝的奠基者。后世帝王普遍尊崇尧、舜、禹,将其作为值得效法的上古圣明之君。清代乾隆皇帝笃信“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毁”,为显示自己的圣绩和盛世,亲自策划将“大禹治水”这一题材雕刻在价值连城的巨玉之上,从而以大禹事迹自勉。

《大禹治水图》玉山的用料产自我国新疆和田密勒塔山,为光滑温润、致密坚硬、色泽晶莹的青玉,重达万斤。其从新疆运至北京时,专门制作了轴长11米的特大滚车,逢山凿岩开路,遇水沿河架桥,夏天以圆木滚动,冬天泼水结成冰道,前面用数百匹马拖拉,后面由上千名役夫推扶,行程1.1万多里,耗时3年。

玉料运抵北京后,乾隆皇帝钦定内务府造办处大臣舒文,以清官所藏宋人《大禹治水图》画轴(《石渠宝笈》著录)为蓝本,令画工贾铨根据玉山原有形状,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十日设计出雕凿纹样,绘制了前后左右四面的图纸,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制作出蜡样(模型)。五月七日,乾隆皇帝批准画样和蜡样,因担心蜡样日久熔化,又下令依照蜡样雕刻木样,同时由造办处完成出坯制料的初步工序。九月,玉料由运河运往扬州,交两淮盐政所辖的当地玉匠进行雕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大禹治水图》玉山历经6年完成雕刻;同年八月十六日,由水路运抵北京。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二十五日,在乾隆皇帝授意下,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工匠朱永泰花了近一年时间,在玉山正面中部镌刻了乾



清乾隆《大禹治水图》玉山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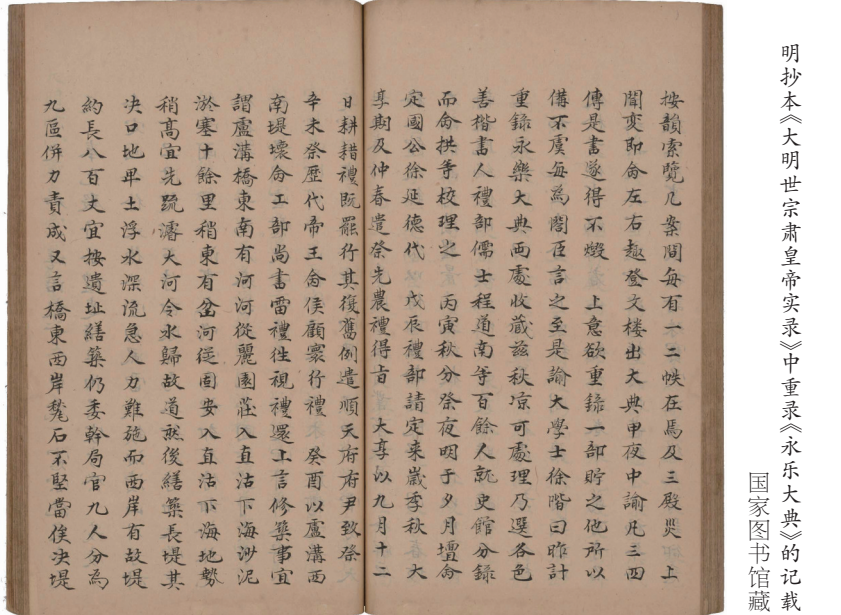
隆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十字方玺(白文);玉山背面上部镌刻了乾隆亲笔楷书的《题篆书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白文)御制长诗,歌颂大禹四年间走遍全国,开山凿石,疏通江河,成功治洪,功德不朽;下部镌刻篆书“八徵耄念之宝”六字方玺。九月,乾隆皇帝指定将《大禹治水图》玉山安放于宁寿宫乐寿堂内,下面承以纹饰精美的高60厘米嵌金丝山形青褐色铜铸底座。至此,《大禹治水图》玉山完成了从采石、运输、设计、雕琢到刻字、安放的全过程,前后共耗时10余年。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5350多公斤,通体精细立雕,峰岩高耸,重峦叠嶂,瀑布飞落,云岚升腾,满山古木苍松,处处洞壑溪涧。玉山从上到下共雕刻了14组人物,既有老翁孺子,也有强壮青年,既有挥锤石匠,也有半辮农夫。他们或持锤开石,或挖土开路,或用木杠撬拉巨石,或以绳索运送树苗。其中,大禹位于正面山腰处,正与追随他的百姓锤钎凿石、镐刨砂砾,一起开山劳作,形象生动逼真。此外,玉山上部还雕有奔跑的麋鹿、跳跃的猿猴,山巅浮云处,更有一位金神带着几名雷公赶来爆破助阵的神奇场景。

这座玉山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综合运用圆雕、高浮雕、内雕等娴熟技艺,根据玉材的天然情况巧妙安排人物、山水,造型雄伟壮观,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工艺和清代玉雕的高超水平。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物映中华



明抄本《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中重录《永乐大典》的记载 国家图书馆藏